

"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途中之镜



李德南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途中之镜

“80后”批评家文丛

李德南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途中之镜 / 李德南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2

(“80后”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222-12838-5

I. ①途…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6040号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书 名 途中之镜
作 者 李德南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838-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64191534

“80 后”批评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刘大伟

副主任：赵石定

主 编：陈思和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程光炜	丁 帆	李 洱	李 森
林建法	刘 涛	缪开和	施战军
宋家宏	王 干	王涑海	吴义勤
张新颖	张燕玲	张颐武	朱向前

总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

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

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

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在水面下丰饶（序一）

张艳梅

近年来，做当代文学批评的人越来越多，这或许与时代大环境有关，与学术发展自然规律有关，当然也与学者个人学术兴趣有关。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中，“80后”学人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杨庆祥、刘涛、金理、黄平、周明全、李德南、何同彬、傅逸尘、徐刚等，这一批年轻学者充满活力，关注文学现场，主动介入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知识背景和学术积累，理性的思想判断力和艺术审美观。他们沿着各自喜欢的领域扎实推进，已经成为一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李德南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德南的文学批评个性鲜明，不仅思想深刻、识见卓异，且文风洗练、富有灵气，这当然得益于严谨的学术训练，同时也与他的文学天分密不可分。人们常说，大海之所以能容纳百川，是因为它把自己放在低处。德南是个低调而沉潜的人，多年来，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与文学不离不弃。这本《途中之镜》收录了他近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一批青年作家创作情况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文学史论、“70后”作家观察、“80后”作家解读、文学问答对话等四部分。全书以《途中之镜》为名，有如下基本含义：首先是暗示书中的文章用意不在追寻“绝对真理”，而是对进行生长的作家和生生不息的文学现场给出个人化的描述与判断，并把本书视为个人在通往文学批评途中的一个小结，用以作为借鉴。“这些途中的思索有幸以相对集中的、镜子般的形式出现”，意义首先在于可以“让我在往后的时光中能借此照见自己所来之路”。另外，在一篇同题文章中德南还说，之所以为本书取名为《途中之镜》，是因为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曾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小说是携带着上路的一

面镜子。”有学者曾把这一说法看作是机械反映论的罪证，美国批评家迪克斯坦在其名著《途中的镜子》一书中却认为司汤达的镜子意象大有深意，“司汤达的镜子意象绝不是机械的，它所指向的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透过若真若幻的各种艺术手法进行观察”。“小说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镜子，而且是折射世界、分解世界的三棱镜……小说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客观真理和多重视角之间的哲学矛盾，通过刷新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而重新塑造世界。”也可以说，德南这本书提供给我们的，就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文学的多棱镜，这些镜像，为我们重构当代文学史观、考察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

其实，二十余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真正回到建构层面，理性看待近现代中国历史、政治运动以及社会生活变动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这个基础，也无法对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更客观审慎、更严肃理性的回答。本书中，德南通过对新世纪小说发展、当代文学思潮演进的梳理，阐发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历史关系的重新思考，体现了一位年轻学人的学术勇气。其中，关于历史化、去历史化和重新历史化的论断尤为令人信服。德南的研究和批评始终是在场的，是从自己的学养和思想内部生发出来的，是建构意义上的推陈出新、中正大气、不激不随，非常难得。正如他在《回到存在本身——细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所说，史铁生是有“我”的写作，其实德南的文学批评也是有“我”的写作，是存在意识很鲜明的写作。“散文的写作，也可以回到个人，回到个人的存在本身。如果散文的写作能做到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然后扩展自己的视域与问题的边界，由个别而一般，由特殊而普遍，那么这种写作非但不会降低他在交流上的有效性，反而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被人接受，被人记住。”这段话用来理解德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建构，应该也是很适合的。

关于“70后”作家研究，德南的观察很细腻，解读也很深入，既有宏观勾勒，也有微观探察。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群体渐渐占据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尤其在小说创作方面有目共睹，对徐则臣、李浩、张楚、路内、弋舟、田耳、阿乙、朱山坡、葛亮、王十月、王棵、蔡骏、李骏虎、曹寇、鬼金、刘玉栋、马拉、冯唐、李师江、海飞、阿丁、陈家桥、慕容雪村、张学东、于晓

威、李修文、东君、乔叶、鲁敏、盛可以、魏微、张惠雯、朱文颖、金仁顺、戴来、付秀莹、计文君、滕肖澜、王秀梅、艾玛、东紫等作家的关注和研究，渐成近年文学批评界的热点。“70后”作家是更具有艺术气质的一代，是特别关注精神信仰、灵魂存在、内在世界的一代，是思想驳杂、风格多样、艺术观念比较先锋的一代，是充满疑问，在自我和社会之间摇摆，很难简单定位的一代。把这一代作家放在大历史和中西文化，以及文学审美的维度上去观照和考察，的确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德南关于弋舟小说创作的文章标题是《有情所累此生》，是目前我读到的写弋舟的文章中很特别的一篇，虽然他只是分析了弋舟部分中短篇小说，不过，他对于“幽暗的厄境”和“庄重的写作”的论述，依然深深打动了。另外，他对王十月、马拉、吴文君、高晓枫等人创作的研究，均别开生面，读来获益匪浅。

“80后”作家成名很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都算是偶像级作家。新世纪以来，一批“80后”作家以远离市场炒作的严肃姿态走上文坛，王威廉、蔡东、郑小驴、马金莲、笛安、孙频、陈崇正、陈再见等等，都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方面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实力。这些“80后”作家重返生活现场，以接地气的写作，展示都市病态、乡村凋敝、人性深渊，其文学立场之严肃、批判意识之鲜明、社会关怀之深远，与当下同样活跃的“70后”作家略有不同。如果说“70后”作家更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重建，那么，“80后”更关注的是伦理生活社会秩序的重建。近年来，对于“80后”作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作为同时代人，德南显然更得心应手，他关注他们、理解他们，愿意和他们深入交流，诚恳地指出他们的长处和不足，他对威廉、蔡东、孙频、小驴等人的解读中，有更多以身同在的生命体验在里面。在《在大视野中审视历史与现实——郑小驴论》中，他甚至谈到了自己的出生，以及自己那不曾谋面就被扼杀的哥哥，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客观评价，谈到当代作家面临的写作禁区 and 思想困境，这种理性的学术态度和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是非常可贵的。在《代际视野下的“80后”文学》对话中，德南和威廉谈到了“80后”这一代作家的创作走向，主张从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视角理解“80后”，也谈到了代际概念下的遮蔽和局限。这些观点都让人耳目一新。书中不少文章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层层深入，抽丝剥茧，最终把作者隐藏的话语意义完整地呈现出

来。如果说小说文本自身是平静的水面，那么批评者的思想则是水面下的暗潮涌动；如果说小说文本是那个充满迷幻的世界，那么批评者的文字就是照见那个世界本相的镜子。

德南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所得。中国当代作家不乏既能创作亦能评论者，在年轻作家中，徐则臣、弋舟、王威廉都堪称文武双全。有人说，创作和批评是不同的思维主导，似乎不可兼得，其实我们看库切、尤瑟纳尔、博尔赫斯等人，同样是写作和评论兼长。认识德南以前，先读过他的很多文章，也读过他的小说，知道他年轻博学，也知道他是有顺老师的高足，对其师承亦颇感兴趣。第一次见到德南是在鲁迅老家绍兴。听着江南水乡的小桥柔波，一起漫步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百年光阴青苔几许，文学如故如新，真是感触良多。初秋的绍兴之夜，细雨迷蒙，几位朋友坐在一起，说起“70后”“80后”的小说创作，平时颇为沉默的德南立刻变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各种评价于我多心有戚戚焉。德南敏锐的洞见、敏捷的思维，对西方经典的信手拈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冷峻分析，以及年轻作家创作情况的熟稔于心，都令我大为敬佩。尤其是对文学，对学术，对朋友之用心、用情和专注，更是令人深深感动。德南的文学思想，在生活和世界的水面下丰饶馥郁、无限生长。这样一位纯净、纯粹的学人，我们怎能不对其抱有热切的期望和无尽的祝福呢？相信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德南会愈走愈见风骨、愈写愈见厚重，作为同道和挚友，我很愿意与时光共同见证这一美好历程。

是为序。

2014年5月28日于山东理工大学博大花园

寻求澄明之境（序二）

王威廉

2011年，对德南和我来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

这一年，德南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经历了湖北、上海近十年的漫长求学之旅后，终于回到了岭南的大本营，开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博士，选择学术作为终身的事业。这一年，我这个在广东求学、工作十数年的西北人，鼓足了勇气，变更了职业，选择写作作为终身的的生活方式。我想，这样的两个理想主义者能够相遇，既缘于外在的神秘机缘，也缘于内在的必然呼应。当我第一次和德南聊天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在广州这座喧嚣的商业城市终于有了一位文学上的对话者。

回想起和德南一开始的聊天，我们似乎总是置身在奇怪的时间和奇怪的地点，比如吃饭间隙的饭桌，比如KTV吵闹的过道上。这要感谢我们在广州的那些共同的年轻朋友，他们的友情与热情让我和德南有了频繁碰面的机会。我和德南在那些奇怪的时间和地点迅速谈及对文学与思想的想法，我们站在角落里窃窃私语的身影像极了兜售摇头丸的小贩；在许多理念上的不谋而合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愈加像是服下了某种难以启齿的药品。我对福楼拜的那句话有了切身的理解：“文学就是让人无休无止沉溺的毒药。”

许多事情的意义要在时间的纵深中缓慢呈现出来。就像我和德南的相遇，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它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两位理想主义者因为找到了同道，在接下来的行走中会显得没那么孤单。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次的相遇对这两个人来说，不仅仅是告别了孤单的慰藉，更是开启了一段极富思想启发与精神创造的友情之旅。

我和德南在上述那些并不严肃的环境下，就很多严肃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话题还被我们反复辩难，直至将这些话题变成了话语的涡流。许多相关的问题被添加进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视域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长期这样的积累，在我们的交流中便形成了一个具备公共品质的思想空间，让我们获益匪浅。有一天，我们觉得聊天中的那些闪光点如果不记录下来似乎有些可惜，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记录下来，仅仅靠我们短暂的记忆，显然不足以让这些结论深化下去，许多瞬间偶得的灵感也会因为遗忘的腐蚀而失去新鲜的色泽。

于是，一篇名为《代际视野下的“80后”文学》的对话录就这样诞生了，我们试图从历史与时代的坐标轴出发，审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特质，从而找到突围的道路。我们先是面谈，再做笔谈，然后反复修改，在保留现场率性的基础上，加深了在许多核心问题上的思辨深度。尽管整个过程不乏辛苦，但是那种充沛的激情始终没有减弱。因为话语的深度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生成的，“他者”在精神上的强度对“自我”始终是一种严厉的挑战与丰饶的馈赠。德南于我，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精神强度的他者，我的许多思绪在他的激发下变成了思想，继而付诸文字，拥有了可以传播的物质力量。如此一来，也可以说德南参与建构了我作为一介作家的主体性。

这个对话做好以后，我们寄给了以关心新锐力量闻名的《山花》杂志，得到了李寂荡主编的热情肯定，发表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从这以后，我和德南的交流变得更加深入和专业起来，我们不再囿于那些奇怪的时间和地点了，我会专程拜访德南，在他的宿舍里泡壶好茶，坐下来慢慢聊。聊到热烈之处，不免又想把那些思想的火花记录下来。迄今，我们又有了好几篇新的对话录，涉及个体精神世界的重建、我自己的写作之路，以及针对当下几位重要作家创作得失的条分缕析。我想，只要我们有精力、有时间，就会一直做下去。这不但见证了两位年轻人漫漫求索的思想轨迹，同时，也见证了我们追溯君子之风之友情。所谓“以文会友”就是这样的吧，通过“文”的媒介，两个不同的生命主体之间得以进行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使得生命的意义变得丰富，超越了一己的局限——这不就是文学带给人类的根本意义吗？

与德南的合作，让我领教了他的认真与勤奋。他的宿舍里堆满了书，而且数量还在高速增长中，最近一次我去看他，发现连《爱因斯坦文集》都在其书架上赫然屹立，让我这个曾经的理科生都感到了汗颜。翻开他的藏书，只要

是他看过的，里边全画满了红红的横线。有些重要的书，里边不仅有红色的横线，还用黄、蓝、黑等多种颜色反复勾勒，一看就知道是啃读了多遍。有一次他拿了本比砖头还厚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给我看其中画线的一段话，告诉我理解与诠释对于存在的重要意义，由于书本过重，他的手臂都有些颤颤巍巍的。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对他来说却是甘之如饴的精神大餐。一个对经典怀有如此敬畏之心的批评家，他的品位一定是厚重与纯正的，值得作者与读者的信赖。

德南的敬畏之心不仅体现在阅读经典方面，在面对同时代人的文本时，他同样秉持敬畏之心去认真阅读和思考。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批评家的道德，那就是对文本价值的尊重。真正的批评，并不是要凌驾在文本之上，以自身的意志（或假借经典的名义）去压抑他者的意志，这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霸道；真正的批评，是胸怀平等之心，本着理解之同情，去和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作者进行深入的精神对话，发现，乃至创造出更为深邃的意义空间。德南研究一位作家，常常能在平凡中发现新意，精彩中发现不足，就缘于他的这种平等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这种平等精神滋生而出的宽容，并不代表他的批评放低了标准，恰恰相反，他特别强调文学的发现，他对没有自身独特发现的那类文字是失望透顶的，但只要让他在作品中嗅到一丝有所发现的气息，他都会兴奋起来，不遗余力地去赞赏与鼓励。我有时会当面取笑他的这种“天真”，但内心却是敬佩的，这种“天真”是他忠诚于文学本身的绝佳例证。

忠诚于文学，正如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在这个物质的时代非常罕见。我经常以此来分辨出同类兄弟的气息。德南就是这样的兄弟，他大学时代开始创作，后来又携带着创作经验进入批评之思，他对作品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哲学的洞察力，给我的启发是很多的。我在面对自身的写作之际，变得比以往认真了不少，思考着如何更有效地将思想融入作品中去，时时警惕着自己的写作是不是浮躁了，是不是滑向了德南批评的那一路。有这样一位能与作家一同成长的批评家，是作家的幸运。

我与德南交往越深，就越发觉得，文学场没有批评家的有效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勃兰克斯、别林斯基、哈罗德·布鲁姆等著名批评家的西方文学史，更无法想象没有《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辉煌是作家与批评家彼此互动、一起写就的。如果说，作家是将那些有意味的事物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批评家就是将这种“意味”变成更加清晰的话语，这个过程绝非简单的转述，而同样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精神创造。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作家将生活抽象成了艺术，批评家从艺术中阐释出了意义，这种意义又滋润了我们的生活，并赐予艺术家以灵感。人类的精神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饱满起来的。德南深谙“阐释”当中蕴含的创造性，因此，尽管他在硕士阶段研究的是博大精深的海德格尔，但他并没有封闭在艰涩的专业术语内部，他孜孜以求的，便是把哲学的精神用在批评的实践中。在他那里，海德格尔的“存在”有着生命的温度，需要身体力行，他置身文学现场就像是置身在世界本身当中，他知道艺术与生活一样，都是晦暗不明的，他甘当那个制造天梯的苦行者，他不仅为我们，更为他自己，在寻找“去蔽”的道。他冷静缜密，却不乏激情，只不过他的激情是向内沉潜的。他是那种用生命来爱文学、爱思想的人，他无法忍受因自己的工作而丢失了心灵的温润。归根结底，他的全部努力，是要逼近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

在这样不懈的努力下，他那一篇篇态度谦和、理解到位的评论文章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写作者的肯定，许多杂志也慕名而来，使他变得稿债如山起来。他感到了压力，不止一次问我：“我能不能少写一点？”我说：“挺住，继续写，你不能做缺席的批评家。”德南攻读博士阶段，跟随的导师是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老师。德南为人低调，很少提及谢老师的威名，但是他的精神底色深深印刻了谢老师的批评精神。谢老师那些深入文学内部的细腻言说准确地把握到了当代文学的繁杂脉象，却没有过于理论化的高耸壁垒，更不会自说自话、隔膜于具体的写作语境，因此他的著作一直是众多写作者的案头必备书。德南文章的气象已经显示出他与谢老师一样，都是坚持在场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家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是这样的批评家在不辞辛劳地提醒着当下创作中的迷失和缺陷，也给予当代文学以应有的自信与尊严。

生活中的德南说话柔声细气，在众人喧嚣之际不喜争辩。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担心说话柔声细气会带来不便，因为你说的话会被他人的声音淹没，或许就会导致你的意志受到抑制乃至侵犯。很多次聚会的时候，我发现德南总是喜欢坐在角落的位置，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不过，我后来才醒悟到，并不是德

南的位置在角落，而是他的沉默把他的位置变成了角落。在我们的印象中，批评家因为职业的缘故，大多都是滔滔不绝的人，善于对各种问题即兴发言，而德南因为性情的安静，更因为主动的退避，他选择成为一位安静的倾听者。这正如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他乐于做一位安静的批评家。

后来，我发现了柔声细气的优势所在。由于他的柔声细气，你就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这样一来，由于你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去听，这些话对你的印象就深了很多。相反的情况是，有些人恨不得拿只大喇叭套在嘴巴上叫嚷，听清这样的话并不需要花费什么精力，反而好像是什么都听见了，可回头一想，嘿，全都没记住！德南自愿自觉的柔声细气，让我们明白，有价值的声音即使再微弱、再细小，也值得我们去倾听。这就像是德南在文章中写到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选择站在低处的，最后反而能抵达高处。”

德南是个热爱生活的人，除了文学以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爱好，比如打网球、游泳、散步等，不过最让我觉得有趣的，还是他热衷于养宠物的爱好。也许他梦想中的宠物是一条美丽的金毛犬，但是现在由于条件所限，他只能养龟。其实，龟的安静与他的安静状态是十分和谐的。他现在饲养了一只巴西大龟，两只小草龟，龟缩在他那被书籍蚕食的狭窄宿舍里。他最溺爱那只巴西大龟，为了给它吃口“新鲜的”，不知道他购买的还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渔网，经常跑去学校的荷塘捕些小鱼小虾。为此，有几次我也不得和他一同前往，在莘莘学子的诧异眼光中，充当幼稚的渔夫。我们站在湖边，搜索着鱼的踪影，当我看见德南发现鱼苗时的惊喜神情时，恍然间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乡间的野孩子，在和玩伴享受着漫长如南方夏季一般无法结束的童年。

我和德南在文学中不倦追寻的，一定与这样的童年有关，这样的童年一定与澄明之境有关。

2013年2月13日